

中国当代文化现象

陈漱渝 主编

ZHONGGUO DANGDAI WENHUA XIANXIANG

评说

郭沫若

P I N G S H U O G U O M O R U O

房向东 / 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陈漱渝 主编

中国当代文

评



郭沫若

沫若

房向东 编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评说郭沫若/房向东编.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5

(中国当代文化现象)

ISBN 7-80094-984-2

I. 评…

II. 房…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②郭沫若(1892-1978)-文学评论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2607 号

评说郭沫若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 字数 359 千字 插页 2

2001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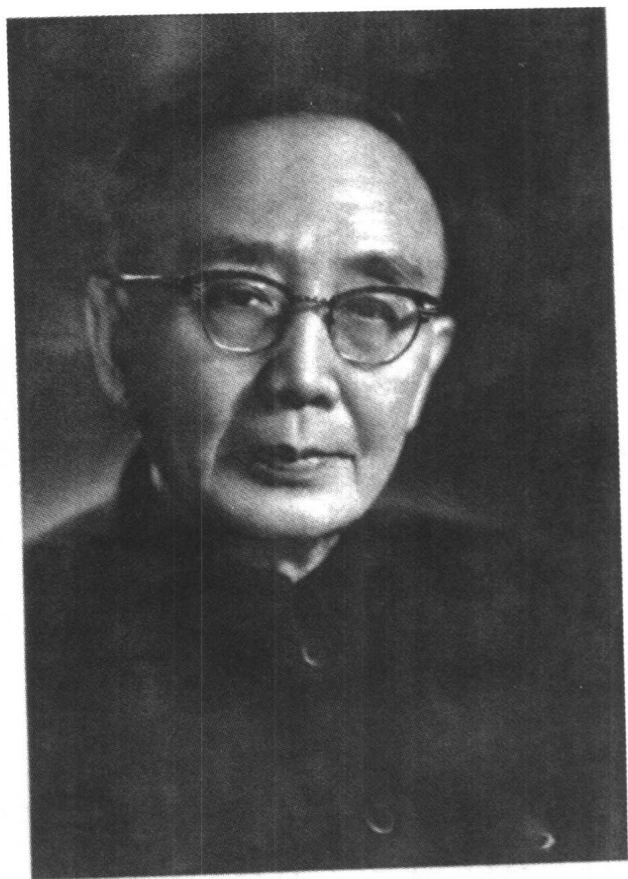
印数:1-10000 册

ISBN 7-80094-984-2/I·5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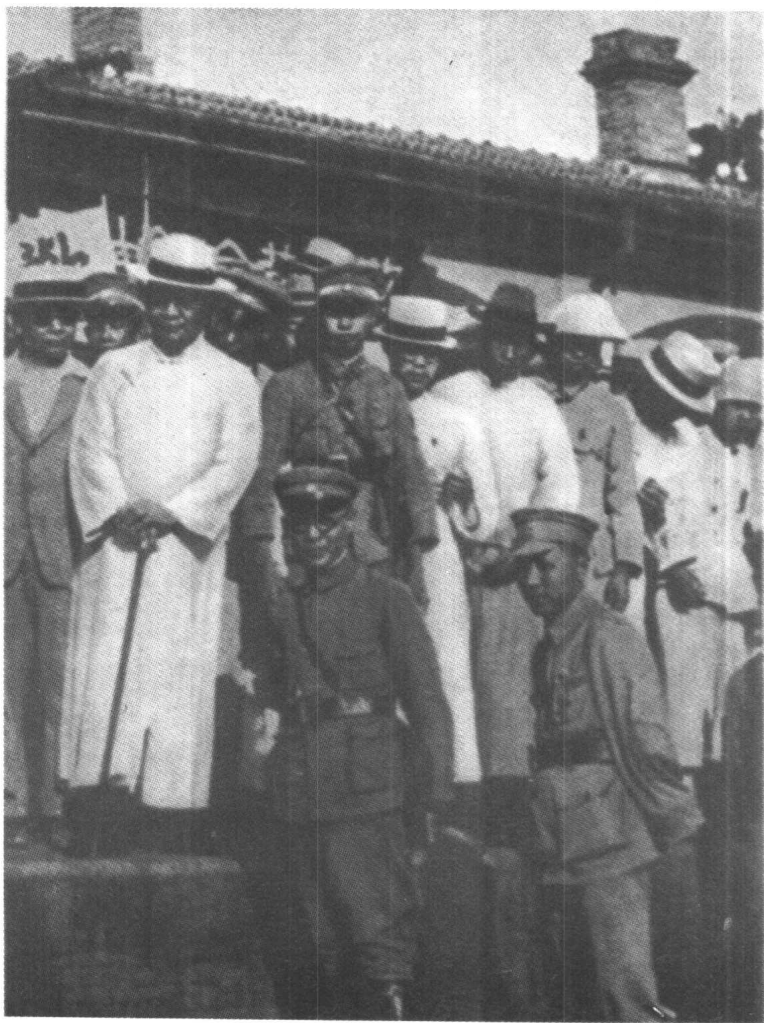
定价:22.8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市场经营部 电话:84040746



鄧誥若



1927年春摄于郑州车站(前排左起第一人为作者)



1938年1月郭沫若与周恩来、叶剑英往汉口大智门车站迎接来自抗日前线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时在车站上的合影



1941年11月重庆各界庆祝郭沫若创作生活25周年及50生辰时，郭沫若与文化工作委员会同仁的合影



1956年5月,全国科学规划工作会议期间,与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宋任穷等和科学工作者交谈



郭沫若在工作中

前 言

房向东

在中国历史上,像郭沫若这样在各个方面都有所建树的人应是不多的。他在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历史、考古、思想、政治史诸方面,都留下了清晰的痕迹,可以说是一个奇特的存在。

郭沫若是时代的宠儿。

恩格斯在论述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时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有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7-8页)人们早已把中国的“五四”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相比拟,也早已把“五四”时代的先驱与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相并论。郭沫若是伟大的“五四”运动所产生的一个新人,他是五四时代的宠儿。他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出类拔

萃,而且也是舌笔和剑并用。

沈从文说,郭沫若既在“翻译与创作,在创作中与诗、与戏剧、与散文、与小说,几乎皆玩一角,而且还玩得不坏。”(沈从文《论郭沫若》,原载李霖编《郭沫若评传》,上海现代书局1932年初版)沈从文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郭沫若首先举起革命浪漫主义的旗帜;最早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在20世纪20年代发生很大影响的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的重要发起人和组织者;在新诗、历史剧、小说、散文、传记文学等文学领域,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的新诗开一代诗风,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他的历史剧别开生面,为现代史剧创作开拓了广阔的道路;他的自叙传作品是形象的历史,从一个侧面描绘了民主革命时代的风云变幻。郭沫若“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考古学、金文、甲骨文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外国进步文艺的翻译介绍等方面,都有重要建树。”(邓小平《在郭沫若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原载1978年6月19日《人民日报》)能够在现代史上作出如此突出的贡献,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在现代知识分子中是不多见的。因此,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巨人。

可是,郭沫若的业绩还不只是这些“立言”之举,他还是“立功”之人,是“学术家与革命行动家兼而为之。”(周恩来《我要说的话》,原载1941年11月16日《新华日报》)1926年,郭沫若就参加了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产生重大政治影响。同年参加南昌起义。抗日战争爆发后秘密回国,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这样的一篇文章里,郭沫若的革命业绩我们难以一一

例举。

夏衍说：“自古以来，讲究人要立功、立德、立言，这些方面郭老都有不可磨灭的成就。立言，他的著作等身嘛！立功，不管是在新文化运动中，还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都立了很大的功，这是有目共睹的；立德，这就涉及为人的问题了，是不是有缺点呢？当然会有一点，但这终究是他伟大一生的次要方面。”（《实事求是地评价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郭沫若》，原载《郭沫若研究·学术座谈会专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是的，正是在“立德”方面，一些人对郭沫若多有非议。

我们来看看特殊时代特殊环境中的郭沫若。

一切以时间和环境为条件。女英雄张志新在“文革”的黑云压顶之际，痛骂逆贼，为捍卫真理献出了美丽的生命，其人格堪称崇高。可是，倘有人把张志新曾经义正辞严表述过的话，在今天又痛快淋漓地重复一遍，我深信，他无论如何不会成为张志新第二的。武松打虎是英雄，要是谁拿了哨棒到动物园里打虎，那只能是小丑，弄不好还要蹲监狱的。

自然，现在不会有人像张志新那样，诅咒那可诅咒的年代了，因为那一页翻了过去，成了历史。目下有谁再在那里写文章骂“四人帮”，绝对出不了名，倒是为“四人帮”之流写写翻案文章——比如说，《龙江颂》也是艺术精品，王力是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等等——有可能语惊四座，一夜登龙。现在时髦的是骂鲁迅和郭沫若这一类人。鲁迅就不说了。骂郭沫若，则是若干年来经常的话题，且郭沫若已经闭嘴，至少在我看来，骂的人多，而少有人出来反驳。因而，郭沫若似乎成了一个人格卑下的无耻文人了！我读了若干这类文章，归纳起来，无非是郭沫若焚书一

事；郭沫若投毛泽东所好写《李白与杜甫》一事；郭沫若治学不严谨，时有错谬甚至有抄袭之劣行等等。自然，郭沫若在这些事情上，有的也不是无可非议。可是，一些骂郭沫若的人，若是在当年勇敢指陈，那我是会诚心诚意地佩服的。问题是，这些名人和非名人当年他们也早请示，晚汇报……到了今天，却跳出来争当事后诸葛亮。他们为什么不去自我忏悔，却还要骂郭沫若呢？骂郭是手段，其目的是通过骂郭而美化自己的人格，巧妙地让自己崇高。他们知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特殊的时代背景呢？一清二楚。他才不管背景不背景，只要有好处，先骂再说。郭沫若是一个巨大的存在，我连郭沫若都敢骂，可见我是够有勇气的吧，是够正直的吧，是够崇高的吧！——话说透了，就这么回事。

对郭沫若的“劣行”进行逐条分析以后，我发现，郭沫若并不像某些人所描绘的那样，是个逢场作戏的人，并不那么丑陋。相反，抨击郭沫若的，我来看去看去，也委实看不出有什么崇高——倘若一定要说有，那也只是假装的崇高。

先说郭沫若焚书。提出要焚烧自己的著作的，最早其实并不是郭沫若，而是巴金。由于巴金的地位与郭沫若不同，所以在全国并没有产生那么大的影响。1965年底，巴金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学习会上，“主动地检查了1962年在上海二次文代会上的发言的错误。我还说我愿意烧掉我的全部作品。”巴金说了自己这样做的目的，“这样讲过之后比较安心了，以为自己承认了错误，或者可以‘过关’。”（《真话集·三论讲真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2月版）很显然，巴金是出于自保才不得已说了一些违心的话，是为了“过关”。

1966年4月14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报告后，即席发言，表

示要“烧掉”自己的一切著作。他说：

石西民同志的报告，对我来说，是有切身的感受，说沉痛一点，是有切肤之痛。因为，在一般人看来，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没有用好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有时候阶级观点很模糊。

郭沫若所处的地位与巴金是大不一样的。他的讲话很快被康生送毛泽东批阅后，交由《光明日报》发表，4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时题作：《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又转载于5月5日《人民日报》。

郭沫若要把自己过去写的书全部烧掉的事，不仅国内各界人士知道了，连国际上的许多人也知道了，莫不为之惊讶。有的人甚至议论说，郭沫若是否马上要垮台，或者已经垮台了？其实，郭沫若所说的“烧掉”一词，有其自身的特殊含义。5月，他在前海西街18号自己的寓所接待松村谦三、黑田寿男、宫崎世民等外宾时，向来访者解释说，“烧掉”就是“自焚”、“涅槃和再生”的意思。会见中，郭沫若指着自己的著作风趣地说：“你们看，书不是通通都还在吗？”他还反复向客人解释，“把书通通烧掉”不是真的要“烧书”，意思是“要像凤凰涅槃(下加木)那样，在自焚后从火中再生。”

郭沫若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将“烧书”表述为“凤凰涅槃”。我们若是结合1920年他写的《凤凰涅槃》加以考察，似乎会有所启发。在题记中，郭沫若写道：“天方国古有神鸟名‘菲尼克司

(phoenix)',满五百岁后,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不再死。”郭沫若在“文革”背景下的焚书,自然没有“凤凰涅槃”那样壮美,但主观上郭沫若肯定是有所联想的,包含有一种对早年诗作意念的回想,包含有一种自我否认的真诚,包含有一种由郭沫若本性难移的固有的诗人气质所派生的冲动,此其一。其二,“文革”是“触及灵魂的运动”,对最高指示——“破四旧”——“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当年,上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下到普通百姓,不是都要过关、表态,甚而至于,周总理也要举着“红宝书”吗?郭沫若采取一些“紧跟”的步奏,采取一些自我保护的措施,有什么可以苛责的?我的一位老同事说,“文革”中,他将民国的邮票都付之一炬,而且还是半夜三更悄悄地干的。今天想来,真是太可惜了。可当年,怕呀!郭沫若也是人,我们若是持平常心,将其和我的那个老同事一样看待,对郭沫若的焚书,其态度是否会平和一些呢?其三,应该说,由于郭沫若的非同凡响,他的焚书,客观上对当年的“破四旧”、“焚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这是被康生等人利用造成的。不可想象,若是郭沫若不焚书,“文革”当中就不“破四旧”了、不到处焚书了。我们只责怪郭沫若是不公平的。

再说投毛泽东之所好。毛泽东是党的领袖,有不少人投毛泽东之所好,但都没有郭沫若这样的大名声,他本身也是过客,就没有人去计较了。这是首先必须指出的。

郭沫若与毛泽东,不似一般人与毛泽东,他们是有过长久往来的。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办农讲所,就请郭沫若前去讲课。毛泽东称郭为“兄”。1945年重庆谈判时,郭沫若见毛泽东带的是旧怀表,便把自己的手表取下来送给了毛泽东。建国后,毛泽东与郭沫若诗词唱和,在毛泽东不多的诗词中就有两首是和郭沫若的。毛泽东常常半夜到郭的住处,与郭谈诗。出于对党的

领袖的尊重,出于他们固有的友谊,出于他们都是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附和毛泽东,为毛泽东的文艺观点做一些拓展、补充、使之具体化的工作,这应是不足为怪的。我印象中,郭沫若是这样一种人,你对我不好,则罢了;你对我好,我就对你更好。毛泽东投之以木桃,郭沫若报之以琼瑶。同是诗人,意气相投,何足深究?遥想当年,鲁迅对郭沫若小有微词,郭沫若也不依不饶,予以反击。而当鲁迅说郭沫若大方向是与其一致的,郭沫若便接连不断发表文章,情绪激动,尊鲁迅为大师,为旗手。蒋介石叛变革命,郭沫若第一个喊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抗日救亡,郭沫若别妇抛雏,秘密回国。蒋介石有所借重,亲自召见,从抗战时局,到甲骨金文研究,关怀备至,大约半是真心半是假意?很快,郭沫若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一文,甚而至于,在文章中高呼“蒋委员长万岁”。郭沫若就是这样一个人,好冲动的性格,诗人的气质。我以为,他是单纯的,无论如何说不上投机。

再说,若讲毛泽东最喜欢的诗人,是李贺而不是李白。郭沫若倘若只是投毛泽东所好,他写的应是《李贺与杜甫》,而不是《李白与杜甫》。此外,扬李抑杜,对郭沫若本人而言,是由来已久的。在《我的童年》中,他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关于读诗上有点奇怪的现象,比较易懂的《千家诗》给予我的铭感很浅,反而是比较高古的唐诗很给了我莫大的兴会。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郭沫若全集·文学篇》第11卷41页)

毛泽东喜欢李白,郭沫若也喜欢李白,这本来可以作为他们友谊的证明,但现在在某些人眼里,却成了郭沫若卑劣的证明了。难道毛泽东喜欢李白,郭沫若就只能喜欢杜甫,这才是有气

节的表现吗？这让我想起了鲁迅的一段话：“莫非……一个讲革命，一个即该讲保皇，一个学地理，一个就得学天文么？”（《三闲集·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一样的，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搞阶级斗争，郭沫若就一定要搞阶级调和。

这里，要补充的是，郭沫若还有过“顶峰”论。他在《红旗跃过汀江》一文中说：“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书家，但他的诗书却成了诗书的顶峰。……每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了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对此，王元化评论道：“这话又说得何其肉麻！”今天，我以平常心观之，一想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实在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肉麻之处。且不说毛泽东的诗词、书法着实是好，“顶峰”论，在当年不是全国都在高喊吗？我想，攻击郭沫若的这些人该不会没有读过林彪的《再版前言》吧？该不会一次也没有做过早请示、晚汇报吧？该不会在“文革”中没有发过任何违心的言论、留下任何违心的文字吧！

最后说一说郭沫若的治学态度和抄袭问题。关于这方面问题的文章很多，我这里要例举的是姚雪垠的《评〈甲申三百年祭〉》。他认为郭沫若的这部著作“是作者在匆忙中赶写成的，不是严肃的历史科学著作”，还举例“对于李岩的死评价得更为不实事求是”，认为郭沫若“为后来史学界出现的所谓‘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开了风气……”（《文汇月刊》1981年第1—3期）

大家知道，《甲申三百年祭》指出李自成由胜转败的原因，在其犯了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在《学习与时局》的讲话中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信中又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

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无论如何,《甲申三百年祭》产生过广泛影响的著作,它在历史上的影响及地位是确定无疑的。当然,也不是说它在某些枝节问题上绝对完美无缺,但我们却不能因此否定其总体的价值。明清史料浩如烟海,互相抵牾处极多,史家征引、诠释上有错误难免,苛责前贤已属过分,对在中国革命史上起过如此重大作用的著作一笔抹煞,更是见小眚而掩大德。闻一多在评价郭沫若时说,哪怕他十句话只有两三句是对的,也是了不起的,因为他说了前人所未说所不敢说的话,毕竟给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有的人什么都遵循古人,也许一句也没有说错,结果也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何况,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以及其他一些著作,也决不是“只有两三句是对的”。不看《甲申三百年祭》的巨大意义和社会价值,抓住一点,不及其余。除了表现了姚雪垠某一方面的精通外,又能说明什么呢?

此外,“以论带史”,或者说先入为主,主题先行,是不是必定在否认之例呢?实在也值得商榷。不论是史学还是文学,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的主观倾向。我以为,姚雪垠也是“以论带史”的,只不过他的“史”不是理论文章,而是小说创作。我读他的《李自成》,读来读去,觉得不像农民起义军,倒很像八路军——我深信,这点绝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看法,而是带有相当的普遍性。

至于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抄袭”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那更是一场闹剧了。丁东在《学术中不能承受之轻》一文中说:“近读余英时所著《钱穆与中国文化》,才知道郭老治学上的实用态度还可上溯到40年代……”接着他引用了余英时的咒骂文章,说:“《十批判书》中至少有五批判书……是基本上根据《系年》的论旨和资料而立论的,其他各篇虽然没有这样严重,但抄

袭的痕迹处处可见。上举抄袭,不仅是资料的,而且还是见解的;不仅是部分的、偶然的,而且还是全面的、根本的。”丁东对余英时的观点,不作学术上的考证,没有调查研究,跟着鹦鹉学舌,咒骂郭沫若“有悖于起码的学术道德”,并奢谈什么学术规则,用轻飘飘的语言说:“这些规则对于郭老来说,本属 ABC,小儿科,是无须讨论的常识。”(《书屋》1996 年第 4 期)我可以断言,丁东根本没有把郭沫若和钱穆的大著作过对比,只是偶尔读了余英时的满是胡说的文章,觉得又有文章可做了,觉得泼一盆污水给郭沫若,自己就变得精通学术规则了,变得学术品格崇高了,因而是说不白不说,说了不白说。好在中国毕竟不是只有丁东这样的鹦鹉,中国有更多严肃的学者,公正的研究家。针对余英时的咒骂,翟清福、耿清珩在《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评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一文中,对余英时的学舌者痛加驳斥,文章严谨缜密,有理有据,套用一句“文革”的语言,可以说是把余英时等批驳得“体无完肤”。在“结束语”中,作者写道:“对于前辈学者,应该尊重而不要无原则地吹捧;可以批评但不应该轻薄地抹煞其贡献。而余英时对待这两位前辈学者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对自己的老师钱穆是吹捧备至并处处为之争发明权,对郭沫若则深文周纳,肆意鄙薄,使用了十分刻毒的字眼加以中伤。这难道是一个正直的作者应有的态度吗?遗憾的是,有的人对《系年》和《十批》既没有研究,又不作任何调查了解,居然对《互校记》大加喝彩,这究竟是一种什么心态,实在很值得玩味。”(《中国史研究》1996 年第 3 期,《新华文摘》1996 年第 10 期)这样看来,是郭沫若“有悖于起码的学术道德”呢,还是余英时以及学舌的“余丁东”?我无法逐条引用翟、耿的文章,但有心的读者若是找来一读,答案一定是不言自明的。